一、发展和区域发展

人类要生存，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首要的前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次由经济领域向非经济的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渗透、拓展，构成一幅绚丽画卷。区域发展只不过是画卷的一角。然而，一滴水能见太阳，窥一斑而知全豹。按照个性和共性相互联结而又相互区别的辩证思路，由特定区域发展的实证分析入手，从揭示蕴涵着发展普遍规律的发展特殊规律着眼，不仅可使区域发展的比较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还将使我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认识上有一个新的飞跃和理性升华。基于此，我们将从发展和发展研究的铺陈开始，逐一对区域发展比较的不同内涵与外延及其特定对象和主要方法作较为周详的介说，为全书逐步展开奠定坚实的理论、方法基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发展和发展研究

如同和平问题一样，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对于何谓发展，怎样才能全面、准确、完整地把握其外延与内涵，借助哪些条件方可达到发展的目标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今中外诸多学人曾从不同视角、采用多种手段作过尝试与探索。为把比较研究纳入规范化轨道，使其科学定位有较为牢固的基础，有必要从理顺发展范畴衍化脉络入手，通过当代发展研究的比较，深入领会、系统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全面发展观，为区域发展比较提供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

1.1 发展范畴的早期衍化

“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范畴。它最早起源于欧洲，由生物学中移植而来，用以说明有机体的成长，揭示其内在的、有机的、渐进的变化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尤其是产业革命的推进，社会生活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发展范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9 世纪 40 年代，在西欧崛起的社会学代表人物孔德和斯宾塞，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把发展与社会进步联结在一起，对社会有机体的运行与演变的目标作了新的论证。孔德就曾明确地指出：“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他在《实证政治体系》第 5 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时强调指出：“（社会）进步就是（社会）发展。”斯宾塞比孔德走得更远。在他看来，社会同任何生物有机体一样，也要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即

单线、渐进、量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化与增长也是发展。① 正是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进化论影响下，后世诸多学者形成了一系列以单线、渐进、量变为特征的发展对应范畴。如迪尔凯姆关于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发展范畴；滕尼斯关于从“社区”向“社会”的发展范畴；雷德菲尔德关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发展范畴；贝克尔关于从“神圣文化”向“世俗社会”的发展范畴，如此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

马克思、恩格斯与孔德、斯宾塞，尽管同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面对的都是产业革命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研究的途径基本类似，有关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理论形成时间也大体相近，对后世社会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们在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问题上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首先，在社会进步与发展问题上，两者针锋相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社会进步这一历史现象是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其原动力既不来自社会外在的地理、气候条件变化，也不是人们的情感、智力和观念，而是物质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因素的变化，因此，社会变迁应以物质生产方式变革为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

①转引自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序）第 3～4 页。

来了。’① 与之相反，孔德却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性即情感、智力发展使然。这显然具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其次，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途径问题上，两者截然不同。孔德，尤其是斯宾塞，从生物进化得出了社会进化的结论，并按照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将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看成是一个渐进、量变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因此无须变革，只要着眼于内部的调适、改良，形成新的和谐，即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却不然，他们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继承、吸纳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事物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并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融为一体，因而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唯物史观，如实地将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矛盾对立统一的有机体，并认为社会发展是通过不断变革乃至矛盾冲突以不断消除社会内在矛盾，最终用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取代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它是一个基本利益差异、对立因而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这种内在矛盾不断激化，使之难以靠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缓解矛盾，消弭冲突，必须靠新生的工人阶级以一系列社会变革直至革命手段，才能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再次，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运行方式问题上，两者看法迥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社会变革这一发展的根本途径时，没有否认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并强调历史发展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进化过程。但是，这种过程绝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进化，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冲突，有时还会导致历史进化的相对停滞乃至暂时的反动（倒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83 页。

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发展范畴的界定，应该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就共同点而言，两者都是从宏观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将发展主要是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即进步，社会发展即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看，先人为我们把握宏观的发展范畴提供了理论来源。就相异点而言，两者的实践表明，“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前者，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按照这种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因而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后者是辩证法的发展观，按照这种观点，矛盾是发展的源泉，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而是活生生的。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② 经由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尽管人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在渐次深化和不断拓展，但是，上述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仍存在，特别是关于发展就是量的增长和历史的简单重复的进化论还有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

②《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1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的单一经济增长观曾一度盛行；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归结为效法、重复乃至全盘照搬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之风曾广泛流传，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发展论争。

2.发展研究渐次升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经济迅猛增长，科技不断进步，特别是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异军突起，发展问题再度凸显，发展研究日趋活跃，并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发展观。

一种是单一经济增长观。其理论来源，主要来自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关于经济发展即生产增长，生产增长即国民财富（后来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观点。50 年代，欧美许多学者及其著作如 A.W. 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5），H. 莱本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1955）和 W.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58）等，就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为样板，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增长为战略，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赶上西方国家为目标的。这种发展观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和 1969 年应世界银行邀请提出的《皮尔逊报告》就是以“增长第一”为基调的。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公开表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① 刚刚从殖民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为，所谓发展，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工业化或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逐步走过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

①在这个公式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目标和标准，社会变革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手段。

50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成是首要的乃至唯一的发展战略。

这种发展战略广泛流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急于增强经济实力，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实施“增长第一”战略的结果，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达到甚至超过了《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的要求。然而，由于在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变革，没有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结果产量上去了，总量增长了，却陷入“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度增长、低度发展”的困境：人口总量急剧上升，失业状况日趋严峻，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政治与行政体制日益僵化，社会关系愈来愈不平等，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总之，这种单一经济增长观及其发展战略，既没有促进社会发展，也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赶上西方国家，却进一步拉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带来了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社会关系严重分化和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等弊端，直接影响、制约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单一经济增长观在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失败，再加上国际间经济、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由此引发了对发展问题的再认识。正是基于上述反思和再认识，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中心的又一个发展观脱颖而出。 1970 年 10 月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就要求有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

以共同和集中行动为基础的全球性发展战略。

同传统的单一经济增长观相比，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中心的发展观有诸多新的突破。首先，发展内涵进一步深化，其标志是人们开始将“发展”与“增长”两个范畴加以区别。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量态扩充，尤应体现为质态提高；它不仅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增长，还意味着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它不仅指经济发展，还应着力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综合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将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引入发展范畴，发展不再只满足于经济领域的进步，还要追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进步。基于对发展内涵的再认识，许多国家在制订国家计划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搞“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是正其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种名称的改变，恰恰是发展观渐次升华的集中反映。其次，发展目标重点转移，其标志是“满足居民基本需求”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其内涵是指满足一个家庭每个人在吃、住、穿等方面消费的最低需求。这意味着得到基本的服务，如饮用水清洁，环境卫生、交通、保健和教育状况的改善；意味着每个能够并愿意工作的人都有一个报酬合理的就业机会；同时，还意味着在质的方面进一步满足需求：生活于一个有益于健康的、人道的社会和令人满意的环境，并普遍参与那些关系到国民和个人自由的决策。为了推行这一战略，不仅要求修正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增加反映生活质量的社会发展指标，而且要求把原来一度盛行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方针转变为“边增长、边分配”或“有增长、有公平”的方针，以使经济增长的成果均等分配，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再次，发展对象不断拓展。如果说，单一经济增长观是以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话，那么，居民基本需求的满足（包括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和生活质量需求的满足），不仅是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那些“过度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因而它必然成为事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发展战略。所不同的是，经由多年的实践，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要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置于发展的首位，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重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应立足本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确定发展目标，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实行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为中心的发展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良好愿望，因而它在 70 年代的发展中国家中有着较大的影响。然而，它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增进个人的福利，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有赖于人的生存、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更离不开人的身心素质的全面提高。如果不从人的全面发展着眼，只从财富分配入手来扩大社会福利，既难以满足永无止境的社会需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将因缺乏内在的动力而难以为继。7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推行满足基本需求战略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公平分配，而且全球性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人们对尽快脱贫的信心愈来愈小。进入 80 年代之后，这一发展观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代之而起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观。

人们在否定单一经济增长观时，就已涉及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问题。早在 1971 年，智利学者 S. 班迪谈及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的原因时就曾明确地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① 按照他的看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质上是人的思想、心理、态度和行为现代化的过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许多国际组

①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织和学者深切地感受到，只从经济增长或基本需求满足入手，仍不足以走出传统的发展困境，必须另辟蹊径进行新的探索，以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被动局面。1979 年 8 月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基多（厄瓜多尔）召开的“新的发展学术讨论会”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受这次会议的委托，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F. 佩鲁在概述学术讨论成果的基础上，于 1982 年出版《新发展观》一书，对人的全面发展观作了系统阐述，并从理论上特别是从哲学高度剖析、论证了一种新型的发展观。

佩鲁倡导的新发展观，与以往的发展研究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异。首先，发展的基点不同。它不是以经济增长分析为中心，而是以人的发展为基点。在他看来，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因此，“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提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这条研究路线和发展方向的核心就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① 其次，发展的视角不同。与以往只注重个别领域发展的学者不同，新发展观十分强调整体的、综合的、内在的发展，坚持目标的综合性和计划的共同性。所谓整体性，即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世界的发展，视为一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所谓综合性，是指一定数量国家之间或一国中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阶级之间旨在增强内聚力的相互协调、兼容；所谓内在性，即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之上，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样一种发展形式。“在这种发展形式中，能够充分发挥和利用人们

①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4，144，175 页。

自身的力量，教育人们运用合适的技术来在国内生产他们维持生活所需的各种东西，而不破坏他们通常的习惯和传统。这既与现代技术合乎机宜的逐步转变完全相一致，也与从国内储蓄筹措资金而实现的内生工业化完全相一致”。① 再次，发展的战略不同。佩鲁认为，任何发展战略都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但是，这种需求满足不能只停留于基本物质需求满足、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之上，而应使之成为“提高整个社会及其所有成员文化水平的杠杆”。为此，应以满足人的全面生活需求为发展战略，其中包括维持个人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需求，每个人享受智力和精神生活（教育）的需求，每个人对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需求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相一致。② 其四，发展的层次不同。在佩鲁看来，发展研究既不能满足于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分析，也不能停留于描述性的福利形式研究之上，因为任何经济增长或福利形式只不过是手段而已，而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它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如果脱离了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任何一种福利形式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的思考。这种文化价值，是一整套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以及思想深处的规范和价值，包括深藏于人们记忆与习惯中的传统、日常交往以及社会知识等评价生活的准则，它通过存在的环境与意识的不断交换而起作用。正是从文化价值底蕴的角度，佩鲁认为“发展的前提是人们之间以商品和服务、信息和符号为形式的交往”，并强调指出，“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深入到人们所设法永久保持的但常常又是虚弱的社会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

①佩鲁：《新发展观》，第 2～3，123 页。
②佩鲁：《新发展观》，第 116，127，14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①其五，发展的方针不同。与以往人们着力于物力资源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针相异，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仅私有的而且公有的经济逐渐陷入外国决策者的控制之中，这些国家正在遭到物质上的损失。因此，这些国家应奉行“有步骤地、不懈地努力去实现与局外人必要的合作和需要自主发展之间的协调一致”方针，并使摆脱外国控制、求得自主发展的努力，与本国人民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相一致，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只有在开始探索、运用和开发人力资源的潜力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会变富还是变穷。这对于那些干预资本积累和干预适合于顾客支付能力的产品制造的老牌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而对于那些正试图跻身于现代经济之网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正确的。”作为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仅对改变贫穷、落后现状，为国家、民族的蓬勃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且于经济、社会变革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要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密的经济产品和智能产品，需要更有能力、更为熟练的劳动者与管理者；反之，使用者和消费者对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又能使经济、社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被人推向前进。要达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就应尽力改进人口的生产和创造能力，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标准持续提高。其中，包括围绕生活条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锻炼，提高个体和群体的标准，为社会进步创造条件；使本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朝着最佳方向发展，以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尽可能地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普及，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人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

①佩鲁：《新发展观》，第 12，15，163，165～166，169 页。

己。①

上述三种发展观，反映了当代发展研究的深度与水平。它们分别从不同领域涉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所应达到的三大目标，即经济增长、需求满足和人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发展所应承担的三大任务，即经济、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在注重、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全球发展这一总趋势。实际上，战后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一体化和国际化已成为当代发展的突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自处，一国或某地区发展脱轨就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国家“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模式广泛流传，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脱节，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被滥加采伐，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再加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人口再生产失控，贫穷、饥饿、失业状况加剧，形成了一系列直接危及社会安全和人类生存的严峻问题与全球危机，如生态危机、能源短缺、人口爆炸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尤为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继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就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以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态发展开始形成共识之后，经过 20 年的不懈努力，以 1992 年 6 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世界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为标志，以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为内涵的可持续发展观及战略，正式为各国政府所认可和接受，成为一种全球性战略、世纪性选择和综合性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性的发展观。按照联合国的解释，“可

①佩鲁：《新发展观》，第 126～127，121，13，11，22，117 页。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不断调整眼前与长远、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发展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功在当代、惠及子孙是其基本特征。就其主要内容看，首先，它坚持以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为前提。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既不是盲目地追求产值总量的叠加，也不是一味强调发展速度无节制地攀升，而以建构质量效益型经济为目标。同时，这种发展还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其中包括人的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以及富者发展需求满足和穷者生存需求满足两者关系的协调。与之相适应，应着力建构可持续发展的人本观念与增长方式。其次，它坚持以发展的可持续为重点，以公正、公平地处理代际、区际、人际关系为保障。其中，包括既注重当代人的发展，但不伤及、危害后代人的发展潜能，又严格规范自我，以不给周边地区、单位带来生态公害，阻滞左邻右舍的发展；既充分发挥个体的才智、潜能，以实现自我价值，又严于自律，防止个体行为失范而伤及他人，危害社会。与之相适应，应着力建构可持续的代际、区际、人际资源配置体系。再次，它坚持以协调为关键，将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准确理解、全面把握四大发展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其中，全面发展的人是主体，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发展是保障，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依托和源泉。与之相适应，应着力建构可持续的协调机制。最后，它坚持以和谐为核心。为此，要求经济发展应以环境的承受能力与资源供给水平为前提，以不影响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标准，逐步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协调”；要求人口再生产和人的发展应以自然环境日益净化为前提，以不影响、不损害生态平衡为标准，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上述要求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观念和行为。与之相适应，应着力建构可持续的人的行为规范体系和约束机制。

3）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观

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畸形发展所作的批判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尽管在历史上比封建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起过更大的进步作用，并出于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进一步拓展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然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却与生产社会化构成了尖锐矛盾，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取资本主义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它铲除了资本剥削制度，扫除了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而为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历史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社会视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并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①

对当代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基本矛盾，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出现严重扭曲，结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偏离经济发展和需求满足的“人的革命化”取代人的全面发展，以致到 1978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处于缓慢乃至停滞状态，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中相当一部分人连温饱都没有保障。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对这种发展缓慢、贫穷落后状态的冷静反思中，经过思想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49页。

方面的拨乱反正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和“全面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著名论断，并倡导和坚持了一种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文明观。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① 稍后，他又从揭示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入手，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命题。其中，协调发展是核心，稳定发展是保障，持续发展是目标。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全面发展所应坚持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对外开放，一手抓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等等。他不但从理性认识上将上述发展方针概括为“两点论”，而且强调指出，通过贯彻这个方针，使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从以上论述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奋斗目标，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环境保护四位一体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文明观，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诸领域

①《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249～250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0，306，378 页。

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作了深入透彻而又富于创新的理论概括。

首先，在物质文明领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将当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看作是精神文明建设和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在这一方面，邓小平不仅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把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强调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同时，他还一再重申，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因此更应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在突出位置，死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只有这样，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国防建设、教育科技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总之，“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具体地揭示了怎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途径。其中包括：以把握、利用机遇为前提，既善于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敢于把握当前对我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所生成的发展机遇及海外侨胞关心、支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独特机遇，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以乘势而上、不断攀登新台阶为特征，力争隔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